

文汇原创丛书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著

文 匯 出 版 社

文汇原创丛书

肖关鸿主编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NBADPP/01

章含之著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6

(文汇原创丛书/肖关鸿主编)

ISBN7-80676-156-X

I. 跨... II. 章... III. 章含之-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8806号

· 文汇原创丛书 ·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作者/章含之 丛书主编/肖关鸿

责任编辑/杨建英 封面装帧/版式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编20000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次/2002年6月第1版 印次/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640×940毫米 1/16 字数/344千

印张/23.875 印数/1-10000

ISBN7-80676-156-X/1·036 定价: 30.00元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辉煌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

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主编

序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即将出版。最初是和老友肖关鸿谈到出这本集子的想法。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紧张起来，日夜赶写，血压都升高了。这都怪我自己，我的一生好像总是很被动地被别的人或别的什么力量推着走。

不过出这本集子我是很高兴的。起初，关鸿说我在上海出的两本集子都早已买不到了，但读者还有兴趣，问我是否可以重出一版。我马上同意了，因为我也常收到读者来信，问我何处可以买到，书店没有。我就从我自己所剩不多的“书库”中寄给读者。但是，我与关鸿都认为不要简单地重版，要有点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所以，我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收进了集子，并以此为书名。此外，我又赶写了一篇《昨日旧事残梦》。我承诺写这篇文章时是因为这是一段我生命中最重要、但却从未真正涉及的阶段。但到我落笔时却百感交集、举笔艰难。1971-1983这十二

年，浓缩了我一生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奉献。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但是也就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又消逝得这样快、这样残酷。从光辉的顶峰一夜之间我和冠华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深渊。我失去了一切……最后失去的是我唯一的财产——我的爱，我所爱的人。那时我的肢体还健在，但是我的灵魂却是空的。人生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年上海的冬天是那样冷，彻骨地冷。雨是那样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一个一身黑衣、头戴黑巾的幽灵多少次在黄浦江畔徘徊……

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

这段逝去的岁月在我写完《十年风雨情》之后就深埋在心底了。我竭力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激励、甚至新的情感。但是，当我开始写这篇《昨日旧事残梦》时，我才知道，那伤痛依旧存在，它只是被轻轻地掩盖而已。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薄薄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我真的无法再一次直面那原以为已成过眼云烟的过去。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必须向读者致歉，那篇文章写得很不充实，很零乱。我竭力想写得轻松，竭力想避开伤痛，结果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我只能承诺，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的感情真

能变得坚强一些，我也许可以给历史、给广大读者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当我坐在这座我生活了四十二年的四合院中重写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遗老”两个字。这使我自己十分震惊，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变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这院子中过去发生的事了？！我的生活就真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了？这本集子题目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

从这里我又想到，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旅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

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两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枝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一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目录

序 /1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1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16

十年风雨情 /75

故乡行 /187

谁说草木不通情 /208

昨日旧事残梦 /224

青桐、秋桐与孤桐 /305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再过几天，园林局要来砍去前院的那棵四十年的高大的榕树了。其实，这树去年就枯死了，就应该砍了，只是我舍不得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这前院是一对榕树。1960年我随父母从东四八条的四合院搬进这个古老的四合院时刚刚二十五岁。那时前、后院的树木都是新栽的。后来，前院的榕树长得很快，两三年后就成荫了。再后来，榕树的粉红色、毛茸茸的花覆盖了一片树顶。这些花可以延续整整一个夏天，每天夕阳西下，它们就开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40年来，那幽香是“家”的芬芳，每当我跨进这四合院的门槛，不论那时我是喜悦还是沮丧，这芳香都会使我感到家的温馨。

四合院的主人几经变迁，现在只剩下我和我那经常不在北京的女儿。四十年中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它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但是这一对榕树却永远忠贞不渝地年年开满一树粉红色的花，用它甜甜的幽香慰藉着主人的心灵。可是大约四年前，西边的那一棵突然“病”了，像



是得了绝症，那“病”来得猛，发展得快，第二年就完全枯死了。园林局来人把它砍了、拉走了，在它原来生长的地方铺上了方砖，它就这样消失了。那时，我为此激动伤心了很久。我祈祷老天保佑那东边的、靠门洞的一棵。但是，厄运还是降落到失去伴侣的它的头上，就在西边那一棵枯死的第二年，这东边的那棵就开始出现萎靡不振。再过一年，就不大开花了；去年，春天来临时，它还勉强长出了半树瘦瘦黄黄的叶子，但还未到夏天开花季节，它就完全枯萎了，死了！我舍不得让它离去，妄想着今年出现奇迹，它还会枯树逢春。但奇迹没有出现，它最终要离去了。

因为这榕树要被砍去了，所以我每天清晨在后院散步时，常常踱步到前院来看看它，抚摸一下它那开始剥脱的树干。现在，这前后两个院里，只剩下北屋门前那棵足有四层楼房那样高的海棠树是四十年前我们迁进51号院时就已栽下的。其余的都是后来陆续换过的。

史家胡同的四合院



当我年岁渐长，真正爱上四合院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栽种这些树木的设计人真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专家。而我们在四十年中换栽的这些树真是毫无章法。当初，这房子是个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大气、庄重。它前后应是三个院落——前院、中院和后院，中院是主院，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南北双朝向的这排房子是穿堂，历来的大官大概都用来作接待来客的前厅。后院是附院。当年不知清朝哪位大官在这里住时，东边还有一个偏院。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偏院成了一个大杂院，与主院完全脱离了，那里现在住了十几户人家。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四合院是多么大的气派！我们家迁入时，本来应是一个前、中、后院齐全的四合院。可是母亲坚持不要那么多房屋。国务院管理局无法说服她，只得把后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后院了。这真是极大的遗憾。

4
当初搬进这院子时，院中树木都已栽齐。前院是那两棵榕树，它们高大而优雅，绿阴遮盖了整个小院。后院北屋房前是两棵开粉红色的海棠。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别偏爱的一种树，在许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有海棠。我们北房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后院很大，大概两倍于前院，因此海棠树的南边，靠近南房，又栽了两株紫丁香，这格局真是美。春天时，海棠的一片粉红色与丁香的浅紫色给这院子蒙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情调。而当它们的花凋谢后，前院的榕花又给夏日的庭院带来了静静的花香。我想那丁香的安排是绝妙的。在前后高大的榕树和海棠之间，丁香只有一人多高，却张开枝叶，在两边直立的大树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图案。

可惜，当初苦心设计的标准四合院的构图，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主要是母亲对四合院一点没有好感，她总是怀念上海的花园洋房，甚至石库门房子。她从不关心院中的草木。这院子交给了做饭的保姆彭阿姨管理。彭阿姨把吃剩的菜汤都往树根下倒。过了几年，西边的海棠和丁香就死了。

后来，这院子越变越不像个院子。60年代初，母亲被三年自然灾害吓怕了。那时，父亲属高干，当时戏称为“糖豆干部”，因为每个月，政府补贴两斤白糖、两斤黄豆。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母亲生怕这种日子还会再来，于是异想天开在院子正中，即

四棵树之间的中央空地做了一个大圆台子，中间铺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这还不够，母亲爱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砖，种了一片苋菜。母亲很高兴，女儿妞妞也快乐。祖孙两人忙乎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变成了农家场院。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都说美国和苏联要打进来。国务院决定给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级干部在院子里挖一个防空洞。工程队开进了四合院，把母亲的玉米、花生坛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东边那棵海棠树旁边挖了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约两米多深，还拐了弯，从南房前西边的梨树旁挖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入口处很宽敞，修了水泥石阶下去。出口处却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墙上做了一个爬梯。



四合院的长廊

出、入口都十分简陋，只不过两块厚厚的铁皮盖，入口的那块足有两米长、一米宽，出口的是一米见方。自从有了这两个防空洞出入口，这正院就彻底地破坏了。

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冠华放弃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树木。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花和竹子。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

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华也就没有坚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两个方面。如果当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这都是传统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二

对于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史家胡同这所四合院才使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6

父亲生前常对我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他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手过的钱财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乐善好施，没有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上海住的两处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让出一部分给我们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亲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无财富，但又从不缺钱。”而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去给比他更需要钱的人。解放后，许多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有收入，都很拮据。他们来找父亲，父亲总是接济他们。为这事，母亲没有少唠叨、抱怨。有时，父亲实在没钱了，就写信给周总理、毛主席请政府解决。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

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所以，这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知道父亲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总理到东四八条54号去看望父亲。这时，总理才知道解放后十年，我们一家一直借住在父亲的老友、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黔老先生的私宅后院。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整整十年，父亲从未向政府开口要过住房。总理那次见到父亲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感到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对父亲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父亲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父亲找一个四合院住宅。本来，许多高级干部当时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其实，我当年和母亲一样并不大喜欢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更喜欢上海那些带花园的西式洋楼。我总觉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里面似乎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从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经过寒气袭人的院子。厨房那么远，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凉了一半。记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饭，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锅上海“全家福”——一只整鸡、一个蹄膀、一块火腿。在端着砂锅走过院子时，因为砂锅从火上刚取下，而当年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寒冷，这一冷一热，砂锅的底掉了，全鸡、蹄膀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这除夕夜很扫兴。

但是这四合院毕竟是个家！尤其是在女儿妞妞出生之后，这偌大的院子里平添了无限的乐趣。我一生中给父母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小生命。搬进四合院时，父亲已是八十高龄，解放后，他的生活变得很简朴、单调，昔日在上海的那许多应酬都没有了，父亲除了出去开开会，偶尔会会友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写他的《柳文指要》。